

走向用户中心:公共图书馆体系对个体发展影响的理论解读*

周文杰

摘要 文章基于用户中心的视角,从理论层面解析公共图书馆体系在实现个体信息富裕化、参与教育活动和促进个体学习三个方面的职能。就实现个体信息富裕化而言,个人信息世界理论提供了理解信息贫富分化现象的整体性视角、工具和证据,从而为解释公共图书馆作为促进个体信息富裕化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就参与教育活动而言,公共图书馆体系顺应了教育本质,为公民终生学习提供了条件,实现了文化的内化,为开放教育提供了可能并为学习者提供了重要的隐性课程资源。就促进个体学习而言,行为主义和认知学派等学习理论流派从不同视角为图书馆职业促进个体学习行为的心理机制提供了解释。基于用户中心视角解读公共图书馆体系的职能,对公共图书馆体系明确地位价值并设计合理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启示。参考文献 46。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个体发展 职能 用户中心

Towards User-Centered: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Public Library System upon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Zhou Wenjie

Abstract: Based on the user-centered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library system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on three aspects: fulfilling the information richness of users, taking part in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promoting learning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For the aspect of users' informatio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World of Individual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tools and evidence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poor divide in information rich. Thus, it also provides the reasons to explain the rationality of how public library system could help their users to be information-rich. For the aspect of taking part in educational process, public library system complies with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e whole-life learning of citizens, internalizes the social culture for individuals,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an open educ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s key hidden curriculum resources for users. For the aspect of promoting the learning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both behaviorism and cognitivism and other learning theories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librarianship in promoting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learning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library system from a user-centered perspective will benefit librarianship both on pinpointing professional value and designing the best development path for public libraries. 46 refs.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Function; User-Centered

1 引言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公共图书馆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近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

发展历程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独立或通过合作方式提供的图书馆服务的总和。从基础设施架构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包括所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8 批面上项目“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的城市图书馆体系化服务模式研究”(编号:2015M580763)研究成果之一。

有实体图书馆、流动图书馆以及它们建立的馆外服务点、图书馆联盟、总分馆系统、区域性服务网络等服务平台^{[1](3)}。

公共图书馆服务作为一种由财政支撑的公共产品,其长久的生命力源于其在实现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以最小的公共财政支出实现最大的服务效益^{[1](3)}。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界致力于开展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总分馆建设、向基层延伸等工作,与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的研究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近年来,仅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相关学术论文已达十数篇之多,涉及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模式及其构建(如于良芝^[3]等、李超平^[4]、熊伟^[5]等)、管理机制(如梁欣^[6])、资源建设(如肖希明^[7]等)等诸多问题。然而,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尽管我国图书馆界对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给予了足够关注,但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者基于用户中心的视角,对公共图书馆体系的职能及其理论属性进行系统考察。

从用户中心视角考察公共图书馆体系的功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在“后现代性”的语境下,用户的信息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个性化信息服务越来越成为信息服务机构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基石;另一方面,社会信息化程度逐步加深,使得公共图书馆和用户都面临着相似的机遇与挑战,表现为:在用户对信息的依赖程度空前扩大的同时,对信息源选择的范围也大大拓展,从而使公共图书馆体系在获得了深度参与用户信息获取过程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其他信息源所取代的挑战。基于此,本文旨在从多学科视角入手,对公共图书馆及其服务体系之于用户个体发展的影响进行解读,以期为公共图书馆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服务工作的推进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

2 公共图书馆体系的信息减贫职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

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等现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信息贫困的问题日益凸显。加强对信息贫困的治理,促进信息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公共图书馆对于促进个体信息的富裕化一直承担着重要职责。这种职责一方面源于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其主要业务活动是信息的提供与服务;另一方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包容、平等也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基本使命。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图书馆事业相对发达的英、美等国率先对图书馆职业在数字化时代应承担的使命进行了阐释,公共图书馆促进社会和谐、包容和平等的社会使命这一“旧”价值被赋予了信息时代的新含义^[8],把促进个体信息富裕化、实现信息公平作为图书馆职业基本价值追求的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9]。有研究表明,当人们在其信息获取的范围内缺失了公共图书馆等优质信息源时,信息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更高^[10]。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图书馆这种组织化的信息源本身作为一种优质信息源的物理存在方面,更重要的体现是,组织化的信息源已经附加了一定的认知建构的努力(如图书馆对信息资源的整序),因此可能使其用户以更小的认知努力而获得更大的信息收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法获取图书馆等组织化信息源,使得某个群体(如农民)中信息相对“富裕”的个体,与其他人群(如专业研究者)相比,仍处于相对信息贫困的境地。

迄今为止,研究者已从多个理论视角对信息贫困发生的原因与机理进行了解读,从而为公共图书馆参与信息贫困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启示。如,信息政治经济学、社会排斥理论、扩散理论、小世界理论、社群信息学、意义建构理论等诸多学说都对公共图书馆的业务活动设计与评估产生过启示。于良芝等通过对上世纪中期以来信息贫困相关理论的综述与分析发现,社会结构和能动性的分歧贯穿于信息不平等研究之中,如果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理论构建要更贴近现实,这些理论能够对政策的制订和问题的解决产生

更强的指导意义,那么,跨越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理论鸿沟,对信息贫富分化现象做出整体性的解释,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理论转向^[11]。基于这种认识,于良芝提出了“个人信息世界”的理论模型,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

所谓个人信息世界,是指个人作为信息主体(information agent,即信息生产、传播、搜索、利用等行为的主体)的活动领域,具有内容、动力和边界三个要素^[12]。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包括各类信息源和信息资产。时间、空间和智识(intellectual sophistication)三个维度共同划定了个人信息世界的范围,从而决定其大小。此外,个人信息世界的动力性体现在个人作用于信息源而开展信息实践,借此获得不同于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经历。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于良芝等开发了个人信息世界的测量工具,并对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世界进行了测度^[13],从而获得关于个体信息贫富程度更全面的认识。

周文杰应用个人信息世界测量工具,以东莞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为案例,对2789位成年人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图书馆对于信息贫富状况不同的人群均具有明显作用。这一研究确认了如下事实:公共图书馆的存在与其用户个人信息世界的丰富化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这种良好互动的存在不仅满足了信息富裕者的信息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信息贫困者走出信息贫困^[14]。

在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保障信息贫富状况不同的人群的信息权利已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责任。对于已经在信息分化中处于有利一端的人群而言,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为其提供优质的信息空间,以满足其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对于在信息分化中处于不利一端的人群来说,能够获得免费的、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无疑对“信息脱贫”意义重大。总之,不论信息分化中处于何种位置的人群,都需要一种制度化的安排,以保障其信息权利的实现。而建设惠及全体公民的、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无疑是一个最为便捷而高效的解决方案^[15]。

3 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教育职能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最早是作为教育活动机构而赢得其存在的合理性的^[16]。苏州图书馆于1914年9月20日开馆之际将“开导民智”“为教育活动之要务”作为该馆办馆宗旨^[17]。1935年,时任苏州图书馆馆长的蒋吟秋指出,“教育为立国大计,开通民智,发明文化,阐明科学”“靡不以教育为依归,而教育活动,尤关重要”^[17]。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图书馆学家Dewey将免费的图书馆服务和免费的学校教育相并列,共同作为“每个灵魂”所具有的基本权利^[18]。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则把“每位读者有其书”的法则看成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即制度安排的问题^{[1](29)}。

具体而言,公共图书馆体系参与教育的职能具有如下理论含义:

(1) 图书馆体系化服务是对教育本质的顺应

理论上,公共图书馆作为教育机构的属性,是源于教育自身边界与本质的界定。一般认为,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19]。有学者指出,所谓教育,就是教育形式和作为教育内容的社会文化的统一^[20]。公共图书馆兼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就内容而言,公共图书馆所拥有的大量经过整序的知识信息资源,无疑是作为教育内容的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就形式而言,公共图书馆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与学校教育体系之间相辅相成,具备完成文化传承的条件和能力。

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是人类文化传递的基本工具和手段,传递性和培养性是其两大属性^[21]。教育的传递性是指人类文化籍由教育行为而实现承上启下。作为一个信息资源丰富、文化传播色彩浓厚的机构,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传递功能不言而喻。教育的培养性主要是指文化对人所内在具有的感染、影响、说服作用^[20]。公共图书馆体系之于公民的教化培养作用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如,Kerslake(1998)研究表明,公共图书馆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有文化、有见识、有参与

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公民,是支持个人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理解和民主制度的重要力量^[21]。

总之,教育的本质在于对文化的传递和对公民的培养,公共图书馆体系开展的服务活动显然具备了这两大属性,因而是对教育本质的顺应。换言之,公共图书馆体系所开展的服务活动及其对用户的影响,正是教育活动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边互动过程和结果的具体体现。

(2)图书馆体系化服务是公民终生学习的必要制度安排

近代教育学家因将视野局限于学校教育领域,没有将对教育活动的理解从学校教育的体系里彻底解放出来,从而备受诟病^[20]。自上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扩散,教育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22]。近年来,随着MOOC等新型教育形式的兴起与普及,教育事业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教育活动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被局限于学校之中。同时,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信息变成了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公民只有通过终生学习方能跟上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步伐。完善终生学习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必要职责。然而,由于现有学校系统在场所、设施和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充分保障公民的终生受教育权利对于既有的教育体系而言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拥有海量的、经过系统化组织与整序的信息资源,无疑为教育跨出学校提供了一级至关重要的台阶。事实上,图书馆之于终生学习的作用早有论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各地通向知识之门,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终生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3]。近年来,图书馆在MOOC等诸多新型教育形式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说,图书馆深度参与基于信息社会的新型教育,既是普罗大众“用脚投票”的结果,又反映出教育变革的基本趋向。对于图书馆职业而言,顺应时代要求,发挥资源优势,担负终生教育这一重要历史使命,既是获得

新的生命力的契机,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3)图书馆体系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内化的重要渠道

有学者指出,教育的功能是将存在于个体之外的寓于物质载体以及语言、文化等精神载体中的文化,内化为以个体的人为载体的文化^[24]。德国教育学家斯普兰格(E. Spranger)指出,教育的作用,是把“客观文化”安置在个人的心灵中,使其能成为“主观文化”,把旧有的那些固定的、已经形成的客观文化转变为一种新的生动的、创造的主观文化^[20]。由于图书馆不仅收集、贮存人类已有的文化资源,更对这些资源进行了组织和整序,因此,图书馆不仅拥有一个完整的“客观文化”体系,也完全具备通过适当的服务行为促进“客观文化”向“主观文化”转化的条件。例如,图书馆依据人类的认知规律与知识结构,将存在于物质载体的“客观知识”进行有效组织并提供给个体使用,由此,为个体将外部文化内化为内在主观文化提供了可能。

(4)图书馆体系化服务是走向开放教育的基本途径

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当代教育主动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具体体现。我国学者鲁洁指出,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我国必须形成新的大教育系统。其中,以图书馆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教育系统是这一大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4]。相对于学校教育有限的开放时间和特定的教育对象,体系化的图书馆服务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从时间上,全天候全年度开放已在图书馆业界渐成趋势;从空间上,实体馆舍和虚拟网络为公共图书馆提供了一个无边界的服务空间;从服务对象上,完备的信息资源体系完全具备影响来自任何教育背景的公民的能力。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教育的开放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图书馆与学校这两个机构之间的相向而行:一方面是“图书馆的学校化”,即图书馆越来越拥有传统学校的功能。例如,当前许多公共图书馆都建成了学习中心,通过MOOC等形式为学习者提供教育资源,开展实质上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是“学校的图书馆

化”,即学校教育的形式越来越明显地突破课堂教学的传统形式,学校越来越多地作为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学习者开展学习活动的平台;而教师则越来越多地作为了个性化学习行为的促进者。例如,当前学校教育领域方兴未艾的“翻转课堂”“研究性学习”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向。无论是学校的图书馆化还是图书馆的学校化,都体现出教育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机构和形式,走向开放化成为促进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的存在,使图书馆体系更深刻地参与教育活动成为必要。

(5)图书馆体系化服务提供了重要的隐性课程资源

社会学领域看待教育问题具有三个理论视角:功能理论教育观(The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冲突理论教育观(The Conflict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和互动理论教育观(The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25,26]。三种教育观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校外机构之于学校教育的影响。最典型的,是互动理论教育观关于隐性课程的解析。隐性课程是“非计划的学习活动”^[27]“是学生在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之外所受的教育”^[28]。从隐性课程的角度看,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大课堂,其资源体系与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履行教化职能。例如,以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资源为平台,用户根据自身信息需求进行检索、阅读,从而实现教育的目的。同时,图书馆体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置根于主流文化之中,这一体系客观上传播了主流价值观,从而服务于既定的教育目标。

4 公共图书馆的学习促进职能

“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图书馆职业达成其职业使命而面临的巨大障碍。长期以来,图书馆对于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建设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职业经验,但在如何促进用户使用这些资源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足。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了图书馆职业活动的价值和前景备受

争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何光国指出,在实践中,图书馆学五定律常变成:书是为收集,不是为利用;有些读者不得其书;有些书在书架上收集尘埃;浪费读者和馆员的时间;图书馆为一成长的旧书仓库^[29]。

图书馆体系重藏轻用及由此而导致的诸多恶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图书馆职业对于信息资源“用”的方面缺乏理性认识,没有能够基于用户视角,从理论上很好地支持和解释经过组织、整序的信息资源如何才能被用户所用。从本质上看,用户对于信息资源的使用行为是一种学习行为,近百年来得到蓬勃发展的学习理论对于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利用实践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1)早期行为主义视角

以巴甫洛夫、斯金纳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基于“刺激-反应”理论而提出的学习理论,开创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先河。早期行为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人已从一组刺激中习得某种反应,在出现另一组类似的刺激时,他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就是泛化^[30]。Guthrie 和 Horton(1946)提出,泛化本身是学习的重要部分^[31]。就图书馆职业而言,知识的序化与组织恰恰是一种促进泛化发生的机制。通过分类法而实现的信息资源整序,由于实现了知识信息的条理化,从而为用户通过对“点”的检索与阅读而获取的知识信息泛化到对“面”的理解与掌握提供了基础。在实体的馆藏中,相似的信息资源被排列在邻近的位置,从而使用户在信息搜寻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泛化的契机,促使更多学习行为的发生。另外,William K. Estes 提出了刺激抽样理论,假定学习者“知觉系统能量有限”,那么具体的学习行为则是一种对刺激要素抽样的过程——只有被用户抽中的要素,才能被纳入到其知觉系统之中^[30]。由于图书馆所呈现的是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客观上为学习者提供了全面而灵活的“刺激要素样本库”。用户对于信息资源内容的选择,事实上是通过刺激抽样而将特定学习内容纳入其知觉系统的过程。由于这种抽样过程是由用户主导

的,因此,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由这种刺激抽样而引发的学习行为更高效。

早期行为主义者所提出的“诱因动机”等概念也对解释发生在图书馆的学习行为具有重要启示。Clark L. Hull 指出,诱因动机是从刺激到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两个刺激越是相类似,其中任何一个刺激就越有可能代替另一个刺激引起条件反应^[32]。无论是知识组织还是馆藏排列,由于具有相似性的知识资源总被整理在相似的位置,因此图书馆职业所营造的知识序化环境为学习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条基本通道,相互邻近的知识载体则潜在地成为学习发生的诱因动机。

(2) 认知学派视角

认知学派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兴起的一个重要学习理论流派。认知学派认为,学习是通过认知、获得意义和意向形成认知的过程,学习是认知结构的组织和再组织^[33]。有内在逻辑的信息资源体系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关联起来,新旧知识发生相互作用,新材料在学习者头脑中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些就是学习变化的实质^[33]。认知心理学在学习理论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1)知识的表征和组织;(2)自我调节,元知识或称为二级认知;(3)学习的社会性和情景性^[34]。显然,图书馆对知识信息的整序和组织与用户对知识的表征和组织的一致程度越高,则学习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信息资源利用的效率越高。另外,图书馆作为社会设计的信息空间,完全具备促使学习活动发生的各种社会性和情景性条件。

根据认知学派的观点,知识可分为程序性知识(即“如何做”的知识)和陈述性知识(即“是什么”的知识)。图书馆所提供的,主要是陈述性知识。认知学派的代表人物 Jerome Seymour Bruner 用编码系统对人们陈述性知识的学习过程进行了解释。他指出,编码系统是一组相互联系的、非具体的类别,编码系统是人们对环境信息加以分组和组合的方式,它是不断变化和重组的,编码系统的重要特征是对相关的类别做出有层次的结构安排^[35]。由于图书馆的基本业务活动是

将“客观知识”进行序化,而序化的结果恰恰是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客观知识编码系统。因此,图书馆职业所从事的信息资源整序活动事实上对应着学习者思维编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衡量信息资源组织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准则是:越是组织合理的信息资源编码系统,应当越符合用户的思维编码系统。Bruner(1967)进而指出,任何学科都可以以适当的结构教给任何年龄阶段的学习者^[36]。Bruner 所强调的学科结构与信息资源的整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对于图书馆职业来说,以适当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并以适当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正是一个促进学习者发现知识的过程,也是图书馆服务由“藏”到“用”的关键环节。Bruner 认为,人类记忆的首要问题不是贮存,而是提取。学习者提取信息的关键在于如何组织信息,知道信息贮存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提取信息^[37]。可见,图书馆职业的生命力在于,将知识组织活动与学习者微观信息组织系统相适应,从而不仅促进学习行为的发生,更帮助学习者保持其学习的成果。

认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研究者 D. P. Ausubel 从知识迁移与同化的角度对学习行为进行了解释。所谓知识的迁移,指过去的经验通过对认知结构发生作用而影响到新的有意义学习,同化(即旧知识吸纳新知识的过程)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迁移现象^[38]。Ausubel 认为,知识同化的一般条件是:首先,学习者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必须具有同化新知识的相应知识基础;其次,学习材料本身应具有内在的逻辑意义,并能够反映人类的认识成果;再者,学习者还应具有理解所学材料的动机^[38]。在这三个条件中,学习材料本身的内在逻辑意义是促使学习发生的关键条件。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资源体系恰恰是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而整序的,因此,图书馆为学习的发生提供了基本条件。出于对学习材料内在逻辑性的考虑,Ausubel 特别强调了发现学习的重要性,即:学习的主要内容不是现成地给予学习者的,而是在学习者内化之前,由他们自己去发现这些内容^[39]。这样一来,学习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学习者在海量

的信息资源中发现内容,而不是提供现成的内容。学习者之于学习内容的发现,本质上正是信息检索的过程;而学习者发现知识的效率恰恰取决于其检索得到的资源是否符合其认知特征的内在逻辑性。此外,Ausubel 的理论还非常强调认知结构与个体经验的结合,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其中表征学习(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概念学习(concept learning)和命题学习(proposition learning)等理念都与信息组织紧密关联。特别是在命题学习中,学习者通过对上位关系、下位关系和组合关系的运用而达成学习目标,这些理念显然都与图书馆职业之于信息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不谋而合。

最近几十年来,很多研究者从建构主义视角对学习行为进行了分析。建构主义者认为,现有的知识是一种关于各种现象的较为可靠的假设,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假设做出自己的检验和调整的过程^[33]。Jean Piager 作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系统地论述了认知发展过程中同化(assimilation)、顺化(accommodation)与平衡(equilibration)的关系。Piager 指出,一切认识都离不开认知图式的同化和顺化,一个人的整体知识始终在被分化成各个部分,然后又把各个部分整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知识^[40]。图书馆职业对客观知识进行整序与组织的目标,恰恰是为建立一个关于客观知识世界的整体性知识地图。这一知识地图之于用户的意义在于,它为用户提供了通过同化与顺化而将客观知识纳入自己认知图式的基本条件。

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也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 Brenda Dervin 及其同事发展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理论。在意义建构理论看来,信息交流过程并不是从发送者传输到接受者,信息的利用也并不是接受者从别人提供的信息中选取一部分,而是信息用户的主观建构活动,信息交流的过程是一连串互动的、解决问题的过程^[41]。意义建构理论为观察用户信息需求和获取的动机、过程,以及从中获取的信息效用和价值提供了建构主义的视

角^[42]。对于图书馆职业而言,只有及时发现用户的信息需求,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提供信息资源,以便促进并帮助其完成学习活动。

数十年来,不少学者试图对行为主义与认知学派进行整合,Robert M. Gagne 是其中最具有成就的代表人物。Gagne 不仅强调个体内在的学习状态,也特别强调学习的外部条件,即学习的环境及学习内容的呈现形式,此外,学习的过程是逐级累积起来的^[43]。不难看出,无论是概念学习还是规则学习,都与信息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学习理论领域的信息加工理论兴起。信息加工理论吸收了行为主义和传统认知理论的有益成果^[37],认为在学习理论领域至少存在三种形式的语义网络:一是 Anderson 提出的命题网络(propositional network);二是 Norman 与 Rumelhart 提出的活跃的结构网络(active structural network)^[44];三是 Newell 和 Simon 提出的产品系统(production system)^[45]。由于这三种语义网络都是针对陈述性知识的,因此,与图书馆通过编目等活动对知识信息进行序化组织的目标和思路都相当接近。

5 结语与启示

图书馆所具有的职能是多方面的。从机构视角看,公共图书馆具有知识保存、文献信息的组织与传递等诸多职能;从用户视角看,实现公民的信息富裕化、参与教育活动和促进个体学习活动是图书馆的三个重要职能。本文从多学科视角概括梳理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于用户中心视角而衍生的三个职能背后的理论质素,从而获得了如下启示:

(1)实现公民的信息富裕化需要建成一个全覆盖的公共图书馆体系

公共图书馆体系从物理环境上覆盖有信息需求的所有用户,既是一项保障公民基本信息权利的制度安排,也对公民的信息富裕化意义重大。为此,图书馆职业需要秉持既有的职业精神,在完善信息资源体系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参与信息

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信息公平。但也必须强调,要想通过建设全覆盖的图书馆体系而取得信息分化治理的最佳效果,尚需要图书馆职业领域的实践者与研究者们“细分”用户群体,深入探查与把握信息贫富状况不同人群的信息行为规律与特征。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图书馆职业对于信息社会背景下各层次人群信息分化的干预能力与调节水平,这不仅是图书馆职业社会价值的体现,也恰恰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术使命所在。

(2)参与教育活动需要公共图书馆主动调整自身功能定位

公共图书馆体系具有教育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图书馆能够自动履行这种职能。就现实状况而言,图书馆界多多少少地倾向于忽视甚至否定这一职能。例如,有研究者指出,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图书馆员有高于其他人的道德水平,且公共资金资助的社会服务需要保持服务的公平性,因此自杜威以来图书馆职业所秉持的教化职能被弱化和放弃了^[46]。事实上,图书馆之所以具备教化职能,是由于其拥有了教育活动赖以开展的信息资源平台和环境。图书馆履行教育职能,并非要求图书馆拥有一批堪为人师的馆员。公共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彰显,需要基于教育理念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进行系统设计并付诸职业实践。一个基本要求是,图书馆界极有必要追踪最新的教育变革动态,关注并积极参与教育领域所发生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捕捉住信息社会赋予公共图书馆的新机遇。

(3)促进个体学习需要公共图书馆积极变革服务模式与理念

对于公共图书馆体系而言,促进个体学习只是一种潜在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开掘,需要图书馆职业的深刻转型。从机构层面看,作为学习促进机构的公共图书馆,须站在用户中心的立场上,建设符合用户认知结构与行为特征的信息资源体系,知识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提供形式都需要根据用户需求而做出全面调整。从从业者层面看,要使图书馆能够履行学习促进者的功能,馆员的知识结构与角色定位都需要深刻转型。

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职能(如知识保存、阅读促进、情报传递等)界定了图书馆基本业务活动的边界与形式。然而,图书馆的传统职能虽然彰显了其职业价值,但这种价值的真正达成最终仍要取决于对用户切切实实产生影响的大小。在理论构建的向度上,公共图书馆体系之于公民个体发展的影响植根于两个理论层面:在宏观层面,信息公平和教育理论支撑和解释了将公共图书馆体系作为促进公民个体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在微观层面,学习理论解释了公共图书馆体系何以可能影响公民的个体发展。展望未来,面对信息社会的诸多挑战(如 Internet 对于传统信息资源提供方式的挑战),充分开掘公共图书馆体系之于个体发展的影响,很可能将是维系公共图书馆事业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一条生命线。

参考文献

- 1 邱冠华,等.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模式、技术支撑与方案[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 2 于良芝.公共图书馆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2).
- 3 于良芝,等.走进普遍均等服务时代:近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构建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
- 4 李超平.中国公共图书馆“嘉兴模式”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6).
- 5 熊伟,等.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馆点线制”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宝鸡市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制度设计为例[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4).
- 6 梁欣.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治理模式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6).
- 7 肖希明,张新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文献资源建设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6).
- 8 Dalton M S. Old Values for the New Information Age[J]. Library Journal, 2000, 125 (18) : 43 -47.
- 9 Kerslake E, Kinnell M.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Libraries and Social Inclusion[J].

- Libri, 1998, 48(1): 1-12.
- 10 周文杰,等.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的信息贫富分化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1).
 - 11 于良芝,刘亚.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信息不平等研究的理论分野及整体性研究的必要[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1).
 - 12 于良芝.“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1).
 - 13 Liangzhi YU, et al.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Rich and Poor: Based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as Information Agents[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6, 72(4): 614-635.
 - 14 周文杰.公益性信息服务能够促进信息公平吗?——公共图书馆对于信息贫富分化的干预效果考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
 - 15 周文杰.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的信息分化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3.
 - 16 于良芝.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来自图书馆使命的注解[J].图书与情报,2007(1).
 - 17 苏州图书馆馆史编委会.苏州图书馆编年纪事(1914—2004)[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1-23.
 - 18 Nardini R. F. A Search for Meaning: American Library Metaphors, 1877—1926 [J]. Library Quarterly, 2001, 71(2): 111-140.
 -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 20 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276.
 - 21 Kerslake, E., Kinnell, M. Public libraries,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public libraries [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 30(3): 159-167
 - 22 (日)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M].李季湄,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 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EB/OL]. [2016-03-01]. <http://www.ifla.org/VII/s8/unesco/chine.pdf>.
 - 24 鲁洁,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53.
 - 25 Hughes, Michael, et al. Sociology: the core[M]. New York: McGraw-Hill College, 1999.
 - 26 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32.
 - 27 陈玉琨.试论潜课程的性质、功能和组织[J].上海高教研究,1988(4).
 - 28 郑金洲.隐蔽课程:一些理论上的思考[J].外国教育动态,1989(1).
 - 29 何光国.图书馆学理论基础[M].台北:三民书局,2001:105.
 - 30 Estes, W. K. Cognitive Architectur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1 (42): 1-28
 - 31 E. R. Guthrie, G. P. Horton. Cats in a puzzle box [M]. New York: Harper, 1946.
 - 32 Hull, Clark L. A behavior system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
 - 33 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60.
 - 34 E. R. Guthrie, F. F. Power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0.
 - 35 Brunner, J. Comment on Beyond Competence [J]. Cognitive Development, 1997, (12): 341-343.
 - 36 Brunner, J. The Course of Cognitive Growth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64, (19): 15.
 - 37 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27.
 - 38 Ausubel, D. P., et al.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ognitive view (2nd Ed.)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 39 Ausubel, D. P. The Facilitation of Meaningful Ver-

- bal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77(12): 162-178.
- 40 Piaget, J. The Graph of consciousnes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41 Dervin, B. Comparative Theory Reconceptualized: From Entities and States to Processes and Dynamics [J]. Communication Theory, 1991, 1 (1): 59-69.
- 42 刘亚.教育对青少年信息贫困的影响 [D].天津:南开大学, 2012.
- 43 Gagne, R. M., Medsker, K. L. 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Training Applications [M].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1996: 8.
- 44 Anderson, J. P. Learning and Memo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New York: John Wiley. 1995: 3-12.
- 45 Newell, A., Simon, H. A. Human Problem Solving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1972: 6-12.
- 46 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 [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5).
- (周文杰 副教授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东莞图书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收稿日期:2016-06-29